

性别角色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张川川 王靖雯*

摘要 传统性别角色强调女性对家庭的责任, 不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就业。本文使用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了性别角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地区, 女性从事受雇佣工作的概率越低, 从业女性的工资收入也越低。尽管文化观念在代际之间传递且相对稳定, 但仍会受到制度和政策冲击的影响。使用各地获得“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性劳动者比例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强度的代理变量, 我们发现, 在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的地区, 当代性别观念越现代化, 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水平也越高。

关键词 性别角色, 女性就业, 收入

DOI: 10. 13821/j. cnki. ceq. 2020. 02. 10

一、引言

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尽管我国政府通过政策法规等手段使女性权益状况有了历史性变化, 但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社会经济领域, 女性在市场就业、收入等方面均落后于男性。北京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0) 显示, 相比成年男性, 成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低 8.74 个百分点, 女性从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从业人口平均收入的 64%。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严重阻碍了女性发展, 这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 也不利于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长远发展。¹

本文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 解释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劳动力市场

* 张川川,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王靖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通信作者及地址: 王靖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84; 电话: 18811377320; E-mail: wangjw.17@sem.tsinghua.edu.cn。本文感谢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与会者的评论和修改意见, 感谢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学术讨论班与会者的修改意见,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71503282) 和霍英东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¹ 需要说明的是, 两性在市场参与程度和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差异, 可能部分地源于两性在生理和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 有其合理性。文献虽然强调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 但是并不意味着要求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男性劳动参与率完全相同。实际上, 传统经济学文献认为, 由于两性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 女性在从事家庭生产方面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女性较多参与家庭生产活动有一定的合理性 (Killingsworth and Heckman, 1986)。

表现。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本文实证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发现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地区,女性从事受雇工作的概率越低,从业女性的收入水平也越低。传统经济学文献从家庭照料负担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家庭分工等角度解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劣势(杜凤莲和董晓媛,2010;熊瑞祥和李辉文,2016;Killing-sworth and Heckman, 1986; Altonji and Blank, 1999),从生育和家庭责任的视角解释女性从业者的工资水平(Millimet, 2000; Sigle-Rushton and Wald-fogel, 2007; Budig and England, 2010),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是由女性来承担家庭照料负担。针对女性劳动力供给行为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传统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制度和政策约束,均未涉及个体偏好或社会信念。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开始有学者重视从心理、个体偏好和社会观念等角度解释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劳动力市场表现。陆续有学者研究文化是否对经济存在影响,并估计特定文化特征对个体决策和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参见张川川和李涛(2015)对该领域文献的最新综述]。文化既可以看作是由特定群体所共同拥有的社会习俗或信念(Greif, 1994),也可以被定义为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偏好(Akerlof and Kranton, 2000)。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认为这两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可以区分为信念和偏好。从目前文化经济学相关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实证研究在定义文化时,都将文化定义为在特定群体中可以代际相传的习俗、信念或价值观,这也是Guiso *et al.* (2006)一文对文化的定义。该领域的一些新近研究用文化来解释女性生育行为、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例如Giavazzi *et al.* (2013)研究发现,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态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Fernandez and Fogli (2005)和Fernandez (2007)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发现文化在解释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发现文化和机构之间的反馈效应影响了一系列经济变量,因此文化可用以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等问题。

文化经济学领域的部分文献进一步研究了文化观念中的性别角色观念,发现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显著相关。性别角色是基于性别差异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特定时期的性别角色观念通常受到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在中国旧时代的封建社会,女性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外出参与社会活动,甚至不能随意露出容貌,活动范围大都局限在家庭内部。虽然随着现代经济的逐步发展和社会劳动方式及分工的变化,现代性别平等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意识,但是现实中对女性的歧视仍然存在,女性或多或少地受到固定传统角色观念,如“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的束缚。理论上,性别角色观念会塑造两性对自身职业选择的预期,女性更倾向于将时间投入家庭工作,支持配偶从事有酬工作。性别观念对两性职业选择所形成的信念和偏好还会进一步在地区层面发生影响,因为如果社会上大

部分人对女性从事有酬工作持有负面看法，那么女性选择有酬工作的效用就会因为在意社会的看法而降低，从而降低女性选择有酬工作的概率。在现有实证研究中，Fortin（2005）采用“概率单位”的方法对OECD的国家进行探究，发现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导致较低的女性就业参与，而且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不容易改变，这就对女性的就业发展造成了长久的阻碍。Fortin（2015）以AIDS的冲击作为工具变量探究了变化的性别角色观念对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Alesina *et al.*（2013）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并且发现性别观念的地区差异起源于农业时代耕作方式的不同。Uunk（2015）和Khoudja and Fleischmann（2015）发现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文化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有重要影响。续继和黄娅娜（2018）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认同，并且性别认同导致家庭中女性工作扭曲。卿石松（2017）发现性别角色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在传统观念作用下，结婚以及成为父母等发生角色转换的节点性事件，通过家庭分工这一作用渠道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Ye and Zhao（2018）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表明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则女性的劳动供给越少。

文化观念通过代际传递且相对稳定，但仍然会受到制度和社会政策冲击的影响。社会信念和个体偏好等文化特征具有其社会经济起源，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和个体经验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由于文化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交互作用，文化可能具有一定的内生性。Giuliano and Spilimbergo（2014）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经历会影响个体在成年后的价值观念；Ebenstein（2014）的研究显示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对当代社会文化有深远影响；Alesina *et al.*（2013）的研究显示性别文化的差异来源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文化观念虽有其稳定和持续的特性，但仍会受到社会运动、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旧中国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传统性别观念使得旧中国女性地位低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推行妇女解放运动使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逐渐淡化。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女权自由思想与妇女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保障妇女参政议政以及提升其经济地位等一系列政策（赵春，2012）。这一系列妇女解放运动是人们改变性别角色观念的萌芽和开端。三八红旗手的表彰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评选活动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通过表彰大会，受表彰妇女在获得声誉和社会尊重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身份的改变（周蕾，2013）。我们用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区获得“三八红旗手”女性的比例作为我国计划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代理变量，考察妇女解放运动对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影响越深入的地区，当代性别观念越趋于现代化，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水平也越高。

本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基于家户调查数据,本文从经验上检验了地区文化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为理解女性社会经济活动参与决策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检验了政府政策和社会运动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为理解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证据;最后,本文也为新近不断发展的有关文化与个体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除此之外,考虑到地级市层面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来源于文化传承和政策冲击,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当代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的影响,本文使用三八红旗手比率代理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程度,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了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更好地解决了传统估计方法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变量,第三部分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和工具变量方法(IV)实证估计了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及收入的影响,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数据和变量

(一) 数据

1.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性别角色观念、女性的就业和收入数据等信息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调查项目。该调查项目旨在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面的数据,反映和总结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为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提供数据支持。CGSS2010年调查的样本覆盖了31个省90个地级市的11785个个体受访者。由于我们考察的是地区层面的性别角色,我们剔除了户口与居住地不在同一个地级市的迁移人口,仅保留具有当地户籍的人口,又因为本文考察的是女性的就业和收入,我们仅保留法定退休年龄前的女性样本,共3871个个体。

2.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收录了自1960年起至2006年全国范围内获得“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性姓名和工作单位。“三八红旗手”评选和表彰活动首次开展于1960年,由全国妇联发起,旨在表彰在中国各条战线上为社会建设做出显著成绩的妇女先进人物和妇女先进集体。“三八红旗手”评选和表彰活动的开展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对中国各地区的性别角色观念起到了深入解放和重新塑造的作用,“三八红旗手”评选表彰活动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某

地区“三八红旗手”越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地区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得越深入、思想解放程度越深，该地区的人们拥有更平等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有鉴于此，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以三八红旗手活动的开展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代理变量，探究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三八红旗手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当代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计划经济时代评选出的各地级市的红旗手数据（1960年和1979年），根据工作单位等信息整理出各个地级市在1960年和1979年两年的评选中共有多少位女性被选为“三八红旗手”。另外，我们根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出各个地级市在当年的人口数，据此对“三八红旗手”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各个地级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八红旗手比率。²我们使用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对各地区影响的代理变量，进而作为各地级市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³

（二）变量

本文所关注的文化特征变量是性别角色观念。CGSS2010年调查问卷中与性别角色相关的变量共有五个：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人天生能力比女人强；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夫妻应该均摊家务。对于这五个问题，调查要求受访者从“1, 2, 3, 4, 5”中选取一个数值表示对所问问题的同意程度，数值从小到大对应“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我们依据样本中个人的打分（1—5分）取每个地级市的均值进行地级市层面上的研究，由于我们考察的是劳动力市场表现，因此我们选取与之最为相关的问题“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生成核心解释变量——性别角色_事业。⁴同时，由于这五个问题都与性别角色观念相关，为了从整体角度看性别角色对于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我们又将五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5—25分）再取地级市层面的均值，得到另一个核心

² 我们使用地区人口数据的目的在于对“三八红旗手”变量进行一定的标准化处理，采用1953年人口数据的原因在于：首先，我们需要使用前定于“三八红旗手”数量的人口数据，即使用1960年以前的人口数据；其次，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必须较为准确且能够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能够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的人口数据只有人口普查，而全国人口普查在1960年之前只进行过一次，即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³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某地级市三八红旗手比率=该市三八红旗手总人数/该市当年的总人口数×1 000 000，代表着计划时代某地级市每一百万人口中有多少个三八红旗手。

⁴ 由于个体的就业决策和收入水平不仅受到自身的信念或价值观的影响，还受到当地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其他劳动者信念或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在地区层面而非个人层面定义文化变量。实际上，目前与文化相关的经济学实证文献中，文化普遍定义为由特定群体所共有的习俗、信念或价值观（Guiso *et al.*, 2006;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因此，将个体信念变量在地区层面上进行加总处理，用于度量特定地区人群的文化特征。作为对结论稳健性的检验，我们也在个体层面定义性别角色观念，估计了个人性别角色观念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解释变量——性别角色_综合。⁵本文分别估计了以上所述两个性别角色变量对女性就业(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是否被他人雇佣)和收入(个人总收入,个人职业收入⁶)的影响,同时控制了年龄、民族、学历水平等变量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我们首先描述了核心变量取值的分布情况。附录中的图A1展示了退休年龄前(男性60岁前,女性55岁前)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的劳动参与和收入明显高于女性,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距明显。附录中的图A2分城镇和农村分别描述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根据以上解释变量的构造方法可知得分越高则表明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由图A2可看出尽管农村的性别角色不平等观念强于城镇,但是这种观念不只在农村流行,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角色不平等观念。

我们以各地区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代理变量,考察了社会运动对性别角色的影响。我们发现性别角色观念在各个地级市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而且红旗手比率高的地区相对应的性别角色观念比较平等,而红旗手比率低的地区性别角色观念则较为传统。基于此,我们将红旗手比率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框架中估计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由于本文关注的因变量是女性就业和收入,因此在回归分析中,我们选取了年龄小于法定退休年龄(55岁)的当地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这部分样本受访者共有3871个。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附录中的表A1。样本描述显示,在各地级市55岁以下的女性样本(本地人口)中,从事非农工作的比例为42%,受到他人雇佣的比例为27%,个人总收入平均为13538元,个人职业收入平均为13419元。

三、实证分析

(一) 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我们首先在OLS回归框架中估计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具体地,我们估计如下方程:

$$Y_{ci} = \alpha + \beta \text{attitude}_c + \gamma X_{ci} + \mu_r + \varepsilon_{ci}, \quad (1)$$

其中, Y_{ci} 代表处于地级市 c 的个人 i 的就业和收入指标,包括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是否受他人雇佣、个人总收入和个人职业收入; attitude_c 为受访者所处

⁵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夫妻应该均摊家务”,我们将其进行重新编号,使得分越高代表越不同意夫妻均摊家务。从而五个问题的打分均为得分越高代表性别角色观念越不平等、传统观念越盛行。我们将五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后得到衡量个人整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变量,其得分的可能范围应为5—25分。

⁶ 此处职业收入指劳动挣得收入。

地级市 c 的性别角色观念，系数 β 衡量了地级市层面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X_{ci} 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比例、学历水平。 μ_r 是区域固定效应。 ϵ_{ci} 为误差项。

表1报告了方程(1)的OLS估计结果，其中包含了两个衡量性别角色观念的指标——性别角色_事业、性别角色_综合。表1Panel A部分回归结果显示，关于“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的观念同意程度越高，即对女性参与事业的不平等观念越严重，则女性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越低，收入也越低。用1—5分来衡量城市性别观念的不平等程度，地区表现出的对女性参与事业的认同程度每减少0.1个单位，退休年龄前的女性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显著减少1.38%，从事受雇佣工作的概率显著减少1.18%，而且她们的收入水平也随着不平等观念程度的增加而显著减少。⁸具体来说，认同程度每减少0.1个单位，该地区女性的个人总收入显著减少10.59%，职业收入显著减少7.42%。表1Panel B部分回归结果同样显示，从整体上来说，性别角色的不平等观念会对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以上述五个指标加总(5—25分)⁹的整体性别角色观念来看，观念传统的程度每增加0.1个单位，则女性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减少0.27%，从事受雇佣工作的概率减少0.28%，个人总收入减少3.69%，个人职业收入减少3.78%。因此，综合而言，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就业和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性别角色越传统，则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低，尤其是从事受雇工作概率越低，且个人总收入和职业收入显著减少。

表1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OLS估计

变量	(1)	(2)	(3)	(4)
	非农工作	受雇	总收入	职业收入
Panel A:				
性别角色_事业	-0.138*** (0.038)	-0.118*** (0.028)	-1.059*** (0.365)	-0.742* (0.415)
观测值	3 855	3 852	3 201	3 050
R方	0.222	0.240	0.096	0.096
Panel B:				
性别角色_综合	-0.027* (0.016)	-0.028** (0.012)	-0.369*** (0.134)	-0.378*** (0.136)

⁷ 我们划分了六大区域，分别是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 and 西北地区。我们通过控制区域固定效应控制地区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⁸ 分值越低表示该地级市关于事业的性别角色观念越平等，分值越高表示该地级市关于事业的性别角色观念越不平等。

⁹ 同样的，分值越高代表着该地级市的整体性别角色观念越不平等。

(续表)

变量	(1)	(2)	(3)	(4)
	非农工作	受雇	总收入	职业收入
观测值	3 855	3 852	3 201	3 050
R 方	0.218	0.237	0.096	0.099

注：样本限制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女性（55岁以下）。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区域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少数民族比例、学历水平。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集聚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CGSS，2010。

(二) 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分城乡估计

既有的一些研究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社会经济影响时，通常认为传统文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大于城镇地区，农村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农村女性地位和经济表现都不如城镇女性。虽然我们在地级市层面衡量文化观念，但是在同一个地级市内，文化观念对于城镇女性和农村女性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为了从实证上检验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我们分别使用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进行了分析。表2报告了分样本 OLS 估计结果。表2结果显示，对于城镇女性，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影响的是城镇总收入和职业收入，而对于农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则显著影响了非农工作和受雇情况。也就是说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存在城乡差距，城镇女性的就业参与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是由于男女不平等观念导致了低收入和低工资；而对于农村女性，由于受到地区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大，农村女性大多待在家中或者从事农业劳动，对女性社会角色认同越低的地区，农村女性参与就业和受雇活动就越少，但是收入没有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她们从事农业劳动或者不参与有酬劳动，因此收入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较小。

表 2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分城乡估计

因变量	城镇		农村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1)	(2)	(3)	(4)
非农工作	-0.021 (0.045)	0.003 (0.015)	-0.155*** (0.054)	-0.044** (0.018)
受雇	-0.050 (0.039)	-0.016 (0.013)	-0.102*** (0.035)	-0.014 (0.013)

(续表)

因变量	城镇		农村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1)	(2)	(3)	(4)
总收入	-1.210*** (0.446)	-0.322** (0.148)	-0.328 (0.404)	-0.232 (0.176)
职业收入	-0.872* (0.494)	-0.296** (0.148)	-0.329 (0.503)	-0.381* (0.214)

注：所有回归控制了方程(1)中的控制变量和区域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集聚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三) 妇女解放运动与性别角色观念

中国的文化观念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性别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各个地级市的性别角色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古代中国，“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在传统社会，女性的价值在于成功做好“妻子”“母亲”的角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化三改”的实施，使得传统家庭分工模式被打破，女权运动空前高涨，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不仅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还领导了妇女解放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康琼，2002；杨慧，2005；赵春，2012）。因此，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对各地区性别角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该运动影响大的城市相对来说在当代应该会具有更为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而受到妇女解放运动影响较小的城市则可能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我们采用如下方程估计妇女解放运动对地区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text{attitude}_c = \theta + \varphi \text{reform}_c^* + \lambda X_{ci} + \mu_c + \tau_c, \quad (2)$$

其中， attitude_c 表示地级市层面的性别角色观念（即变量性别角色_事业、性别角色_综合）， reform_c^* 表示各地级市受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程度， μ_c 表示区域固定效应， τ_c 表示误差项。

式(2)中各地级市受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的程度大小是无法直接衡量的，但计划经济时代(1949—1978)，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全国妇联开展了“三八红旗手”表彰活动，此项活动可以看作是全面提高妇女素质、鼓励妇女参与劳动就业的一项代表性运动。全国妇联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通过组织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化进程实现妇女解放，促进男女平等。全国妇联于1960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评选

和表彰活动,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通过表彰大会,受表彰妇女在获得声誉和社会尊重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身份的改变(周蕾,2013)。

三八红旗手评选的标准:一是思想红、干劲足;二是在工农业生产上、在集体生活中及社会服务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三是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刻苦学习和钻研科学;四是善于团结群众发挥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个人工作表现为评选的主要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女性群体的影响程度,因此我们将各地评选的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各地区受到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我们根据《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一书整理了1960年和1979年两个批次各地级市评选出的三八红旗手数量,并依据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了相应地级市对应的人口数,计算出各个地级市对应的(1960年+1979年)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的代理变量。我们采用如下方程,估计各地区三八红旗手比率同当地性别角色观念的关系:

$$\text{attitude}_c = \theta + \varphi \text{redflag}_c + \lambda X_{ci} + \mu_r + \tau_c, \quad (3)$$

其中, redflag_c 代表地级市 c 的三八红旗手占1953年当地人口的比例, attitude_c 仍然代表地级市层面的性别角色观念变量。 X_{ci}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学历水平,以及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表3报告了方程(3)的估计结果。表3估计结果显示,各地级市在计划经济时代评选出的红旗手人数占当地人口的比率越高,则该地区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越趋于现代化,性别角色观念越平等,这验证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现代各地区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表3 “三八红旗手”比率和当代性别观念

变量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1)	(2)
“三八红旗手”比率	-0.004*** (0.001)	-0.012***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 863	3 863
R方	0.400	0.387

注:红旗手比率的相关信息整理自《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少数民族比例、学历水平。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集聚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尽管地区“三八红旗手”的比率跟当地建国以后所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度密切相关，但无法排除“三八红旗手”的比率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该地区历史上的性别文化观念。由于“三八红旗手”比率是基于1960年和1979年的数据进行的计算，属于前定变量，工具变量估计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即就业和收入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但是无法十分理想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用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估计了各地级市“三八红旗手”比率同一系列地区可观测的经济变量的关系，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变量同“三八红旗手”比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系，表明工具变量是较为外生的。我们将具体结果放入附录中的表A2。

(四)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再考察：工具变量估计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将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缓解前面的OLS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方程(3)可以作为工具变量的一阶段估计。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来估计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4中。

表4 性别观念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IV估计

变量	非农工作 (1)	受雇 (2)	总收入 (3)	职业收入 (4)
Panel A:				
性别角色_事业	-0.156 (0.114)	-0.183*** (0.066)	-4.999*** (1.676)	-4.265** (1.700)
Kleibergen-Paap F 统计量	12.473	12.557	12.171	13.304
观测值	3 855	3 852	3 201	3 050
R 方	0.222	0.238	-0.003	0.028
Panel B:				
性别角色_综合	-0.050 (0.037)	-0.059** (0.023)	-1.635*** (0.487)	-1.395*** (0.483)
Kleibergen-Paap F 统计量	14.929	15.001	14.586	15.648
观测值	3 855	3 852	3 201	3 050
R 方	0.216	0.233	0.009	0.052

注：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少数民族比例、学历水平。括号中为城市层面的集聚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IV估计结果与OLS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仍然显示了性别角色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估计系数

与 OLS 的结果相比有所增大,一方面,这表明 OLS 估计结果存在低估,可能是由于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或城市特征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遗漏变量偏误。另一方面,由于 IV 估计利用了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外生冲击,而受思想解放运动冲击比较大的地区往往是计划经济时代性别观念更为传统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女性劳动者受到性别观念抑制的程度更深,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从而使得 IV 估计所得到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大于 OLS 估计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

性别角色观念会影响女性的就业参与,而女性的就业参与又与女性收入联系紧密,因此,前文针对收入的估计包含了一部分就业的效应,即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劳动参与影响了收入水平。为了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收入的直接影响,我们在针对收入的回归方程中加入了“是否拥有非农工作”这一控制变量,控制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女性就业参与来影响收入这一传导途径,估计性别角色观念对收入的直接影响。表 5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女性就业状况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收入仍然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系数估计值略有下降。表 5 结果表明,性别角色观念本身直接影响了女性的收入,换言之,由于地区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即便是找到工作的女性,其收入水平也因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而显著降低。

表 5 性别观念对女性收入的直接影响

变量	总收入	职业收入
	(1)	(2)
Panel A:		
性别角色_事业	-4.622*** (1.624)	-3.730** (1.631)
非农工作	2.896*** (0.267)	3.412*** (0.291)
Panel B:		
性别角色_综合	-1.505*** (0.463)	-1.214*** (0.458)
非农工作	3.065*** (0.242)	3.536*** (0.262)

注: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以及区域固定效应同表 4。仅在收入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非农工作这一控制变量。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集聚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综合表 3 至表 5 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所处的文化环境——地区性别角色观念对她们的就业和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各地级市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文化

传承因素，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各地区影响程度的不同构成了现今各地级市性别角色观念差异的来源。那些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更小的城市保留了更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更低，性别不平等观念更严重，导致了女性更低的受雇率，较低的总收入和职业收入。

（五）稳健性检验：性别角色观念与男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地级市层面的性别角色观念之所以显著地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在于性别角色观念上的男女不平等，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容易受到歧视。由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是对女性造成了束缚，对男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应当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即使由于家庭联合决策，男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可能会因为配偶受到影响而有一定的溢出效应，效应也不应当太大。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男性样本（年龄小于60岁的），估计了地区性别角色观念对于男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表6报告了回归结果。表6结果显示，地区性别角色观念除了对男性总收入有边际上显著的影响外，对男性就业和职业收入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表6 性别观念对男性就业与收入的影响：IV估计

Panel A: 男性就业情况				
因变量	非农工作		受雇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自变量	(1)	(2)	(3)	(4)
	-0.037	-0.011	-0.135	-0.041
	(0.136)	(0.042)	(0.124)	(0.039)
观测值	3 977	3 977	3 972	3 972
Panel B: 男性收入情况				
因变量	总收入		职业收入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性别角色_事业	性别角色_综合
自变量	(1)	(2)	(3)	(4)
	-1.054*	-0.323*	-0.931	-0.287
	(0.630)	(0.183)	(0.723)	(0.203)
观测值	3 529	3 529	3 427	3 427

注：Panel A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少数民族比例、学历水平，Panel B额外控制了非农工作以考察性别角色观念的直接影响。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集聚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四、结 论

女性的权益和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虽然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不平等的事实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现有研究在探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时,大多关注经济、制度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很少关注个体偏好或社会信念的作用。经济心理学的发展使得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化信念的影响。本文基于文化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同时探究了社会运动在性别角色观念演化中的作用。

基于微观家户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地区,女性从事受雇工作的概率越低,个人总收入和劳动挣得收入也越低。文化观念虽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起源,并且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但仍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使用三八红旗手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当代性别角色观念具有显著的影响,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的地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越淡化,越强调性别平等。在此基础上,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地区性别观念的工具变量,我们也进一步估计了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因果效应,得到了同 OLS 估计一致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是影响中国女性劳动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尽管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但仍然受到妇女解放运动等经济社会变迁的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要从根本上纠正中国就业和收入不平等,有赖于通过文化宣传和教育的方式逐步改变人们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性别规范,塑造有利于女性发展的文化制度环境。

参 考 文 献

- [1] Akerlof, G., and R. Kranton,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 (3), 715-753.
- [2] Alesina, A., and P.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53 (4), 898-944.
- [3] Alesina, A, P. Giuliano, and N. Nunn,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28 (2), 469-530.
- [4] Altonji, J., and M. Blank, "Race and Gender in the Labor Market",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3 (99), 3143-3259.
- [5] Bertrand, M.,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2011, 4, 1543-1590.

- [6] Budig, J., and P. England.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66 (66), 204-225.
- [7] 杜凤莲、董晓媛, "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以中国城镇为例", 《世界经济》, 2010年第2期, 第51—66页。
- [8] Ebenstein, A., "Patrilocality and Missing Women", *Working Paper*, Hebrew University, 2014.
- [9] Fernandez, R., "Women, Work,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 (2-3), 305-332.
- [10] Fernandez, R., and A. Fogli, "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09, 1 (1), 146-177.
- [11] Fortin, 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Women'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Opting-Out, Aids, and the Persistent Appeal of Housewifery", *Annals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2015, 117-118, 379-401.
- [12] Fortin, 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of Women across OECD Countri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5, 21 (3), 416-438.
- [13] Giavazzi, F., F. Schiantarelli, and M. Serafinelli, "Attitudes, Politics, and Work",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3, 11 (6), 1256-1289.
- [14] Giuliano, P., and A. Spilimbergo, "Growing Up in a Recess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4, 81 (2), 787-817.
- [15] Grei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 (5), 912-950.
- [16]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 (2), 23-48.
- [17] 康琼, "论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2年第3期, 第45—46页。
- [18] Khoudja, Y., and F. Fleischmann, "Ethnic Differences i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Adding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Religiosity to the Explan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31 (1), 91-102.
- [19] Killingsworth, R., and J. Heckman, "Female Labor Supply: A Survey",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1, 103-204.
- [20] Millimet, L., "The Impact of Children on Wages, Job Tenure,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0 (462), 139-157.
- [21] 卿石松,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 《社会科学》, 2017年第11期, 第91—100页。
- [22] Sigle-Rushton, W., and J. Waldfogel, "Motherhood and Women's Earnings in Anglo-American, Continental European, and Nordic Countries", *Feminist Economics*, 2007, 13 (2), 55-91.
- [23] Uunk, W., "Does the Cultural Context Matter? The Effect of a Country's Gender-Role Attitudes on Female Labor Supply", *European Societies*, 2015, 17 (2), 176-198.
- [24] 熊瑞祥、李辉文, "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6年第16卷第1期, 第393—414页。
- [25] 续继、黄娅娜, "性别认同与家庭中的婚姻及劳动表现", 《经济研究》, 2018年第4期, 第136—150页。
- [26] 杨慧, "论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 《社会主义研究》, 2005年第4期, 第106—208页。
- [27] Ye, B., and Y. Zhao,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Wife'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47, 116-141.

- [28] 张川川、李涛,“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经济动态》,2015年第1期,第96—108页。
- [29] 赵春,“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文化批判视角和女权自由主张”,《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0—25页。
- [30] 周蕾,“国家表彰与妇女解放——1960年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69—75+126页。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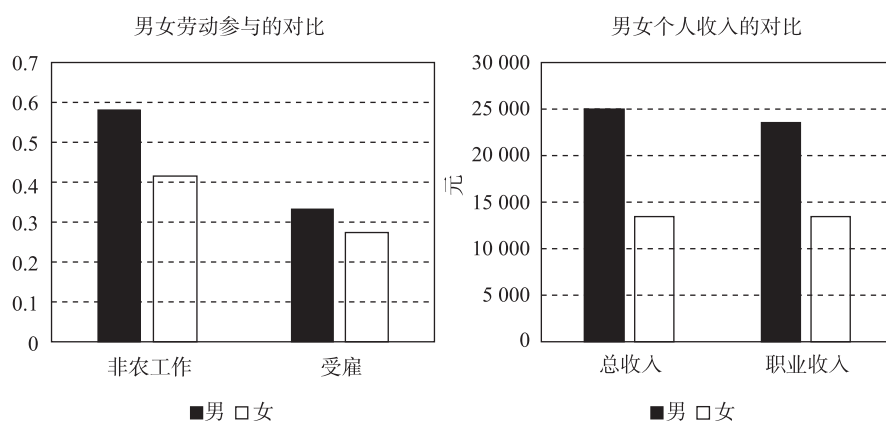


图 A1 男女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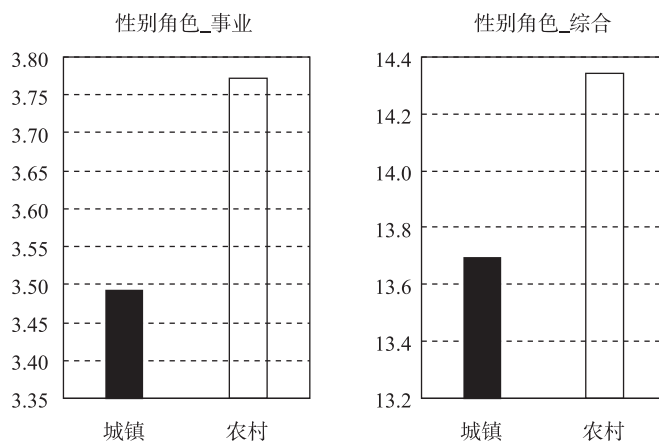


图 A2 城乡性别角色观念对比

表 A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劳动回报			
非农工作	0—1 变量, 是否从事非农业的工作	0.42	0.49
受雇	0—1 变量, 是否从事被他人雇佣的非农业工作	0.27	0.45

		(续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总收入	个人的全年总收入, 加1取log	7.59	3.53
职业收入	个人的全年职业收入, 加1取log	7.23	3.80
性别观念			
性别角色_事业	地级市层面变量, 对“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的认同程度	3.62	0.34
性别角色_综合	地级市层面变量, 对五个问题的认同程度	13.99	0.97
人口层面变量			
户口	0—1变量, 0为农村, 1为城镇	0.45	0.50
年龄	连续变量, 年龄大小	38.77	9.66
民族	0—1变量, 0为汉族, 其余为1	0.10	0.30
少数民族比例	连续变量, 范围在0—1	0.10	0.22
学历水平			
文盲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0.13	0.34
小学	私塾以及小学	0.23	0.42
初高中	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	0.48	0.50
大学及以上	大学生、研究生及以上	0.15	0.35
女权运动			
三八红旗手比率	地级市层面变量, 计划经济时代各个地区每一百万人口中有多少个三八红旗手	32.09	28.01

数据来源: 劳动回报、性别观念以及人口层面变量均来自CGSS(2010), 红旗手比率是依据《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计算。

表A2 各地区“三八红旗手”比率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变量	“三八红旗手”比率
人均GDP(万元)	5.279 (3.481)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0.000 (0.000)
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万元)	0.000 (0.00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0.000 (0.000)
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万元)	-0.000 (0.000)

(续表)

变量	“三八红旗手”比率
常数项	23.717*** (6.393)
观测值	80
R方	0.097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三八红旗手数据由《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到，经济变量有关数据整理自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Gender Roles and the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Women

CHUANCHUAN ZH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GWEN WANG*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we try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gender roles on the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women. We find that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emphasizing women's responsibility for housework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earnings of women. Although the gender roles are persistent and transmit across generations, we find tha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significantly reshape the gender roles, where we proxy the intensity of local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using local numbers of the National March 8th Red-Banner Pacesetters in 1960 and 1979. Using the intensity of local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as instrument for gender roles, we find consistent evidences that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de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employed and earnings of women.

Key Words gender roles, female employment, income

JEL Classification J16, J21, J71

* Corresponding Author: Jingwen W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Tel: 86-18811377320; E-mail: wangjw.17@sem.tsinghua.edu.cn.